

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

JOURNAL OF LANGUAGE POLICY AND LANGUAGE PLANNING

1 Vol.1 No.1
第1卷 第1期
2014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

JOURNAL OF LANGUAGE POLICY AND LANGUAGE PLANNING

1 Vol.1 No.1
第1卷 第1期
2014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 2014. 1 : 汉英对照 / 戴曼纯主编. — 北京 :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4.9
ISBN 978-7-5135-5107-6

I. ①语… II. ①戴… III. ①语言政策—研究—汉、英 IV. ① H0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20934 号

出版人 蔡剑峰
责任编辑 荀晓鸣
执行编辑 解碧琰
封面设计 孙敬沂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印 刷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5.5
版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5-5107-6
定 价 12.00 元

购书咨询: (010) 88819929 电子邮箱: club@fltrp.com

外研书店: <http://www.fltrpstore.com>

凡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联系我社印制部

联系电话: (010) 61207896 电子邮箱: zhijian@fltrp.com

凡侵权、盗版书籍线索, 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

举报电话: (010) 88817519 电子邮箱: banquan@fltrp.com

法律顾问: 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 斌律师

物料号: 251070001

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 (半年刊)

Journal of Language Policy and Language Planning (Bi-annual)

主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Administer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China

主办：北京外国语大学

Directed by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承办：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

Edited at the National Research Center for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出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顾问 (按姓氏音序)

Consultants (in alphabetical order)

陈章太

Chen Zhan tai

刘润清

Liu Runqing

孙宏开

Sun Hongkai

主编：戴曼纯

Editor-in-chief: *Dai Manchun*

编辑：张天伟 李艳红

Editors: *Zhang Tianwei, Li Yanhong*

编审委员会 (按姓氏音序)

Editorial Board (in alphabetical order)

主任

Chairs

李宇明 北京语言大学

Li Yuming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文秋芳 北京外国语大学

Wen Qiufang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委员

Members

蔡永良 上海海事大学

Cai Yongliang (Shanghai Maritime University)

戴桂菊 北京外国语大学

Dai Guiju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戴庆厦 中央民族大学

Dai Qingxia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傅荣 北京外国语大学

Fu Rong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郭龙生 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

Guo Longsheng (MOE Institute of Applied Linguistics)

韩宝成 北京外国语大学

Han Baocheng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侯敏 中国传媒大学

Hou Min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黄行 中国社会科学院

Huang Xing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贾文键 北京外国语大学

Jia Wenjian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束定芳 上海外国语大学

Shu Dingfang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苏金智 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

Su Jinzhi (MOE Institute of Applied Linguistics)

王克非 北京外国语大学

Wang Kefei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张治国 上海海事大学

Zhang Zhiguo (Shanghai Maritime University)

周庆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

Zhou Qingsheng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电话: (010) 88818236

本刊地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北京外国语大学

邮箱: yzcgjy@126.com

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编辑部

创刊词

戴曼纯

在国际学术界,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早已成为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核心领域之一,备受学界关注。专门刊发此类研究成果的国际学术期刊有《语言政策》(*Language Policy*)、《语言社会学国际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语言问题与语言规划》(*Language Problems and Language Planning*)、《当代语言规划问题》(*Current Issues in Language Planning*)、《欧洲语言政策期刊》(*European Journal of Language Policy*)等,其他刊物如《双语研究期刊》(*Bilingual Research Journal*)、《语言、身份及教育期刊》(*Journal of Language, Identity, and Education*)、《社会语言学期刊》(*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社会中的语言》(*Language in Society*)、《多语言》(*Multilingua*)、《对外英语教学季刊》(*TESOL Quarterly*)等也刊发相关论文。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领域在过去几十年中出版了大量学术专著,尤其是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Palgrave, Springer, CUP,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Routledge, John Benjamins等出版社推出不少系列著作,对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的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过去数十年中,我国的语言政策及规划研究在国家语委等有关部门的指导下取得了丰硕成果,汉语规范化、普通话推广、少数民族语言建设为促进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民族和谐等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近些年来,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在学界日益得到重视,关注的范围涵盖国内外语言政策及规划问题,研究的问题不仅涉及语言地位、语言本体,还包括语言政治、语言生态、国家语言能力等重大问题,有的研究还上升至语言战略和国家安全高度。

学界对语言政策与规划的关注度从中国知网数据可见一斑。搜索中国知网数据库文章名包含“语言政策”或“语言规划”的文献,我们发现2000年至2013年国内发表的相关学术论文数呈逐年上升趋势,且增幅惊人。2000年题目含“语言政策”的文章为4篇,含“语言规划”的文章为3篇,2013年分别达到45篇和38篇。以“语言政策”为关键词搜索文献,也增幅甚大,由2000年的14篇上升至2013年的122篇。以“语言规划”为关键词搜索也发现近似的增幅,2000年为11篇,2013年达到84篇。此外,还有大量没有注明这些关键词的文章。很显然,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已然发展为一门愈受关注的学科。

为了推动我国的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学科的发展,更好地为国家服务,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在学校及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支持下,创办《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杂志。

《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是国内第一种以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学科名称命名的专业刊物,目前常设栏目有语言政策与规划学科建设(包括语言教育政策)、语言政策国别研究、语言规划研究、语言生活、语言理论、书刊评介等。我们的宗旨是:为国内从事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等宏观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学者、从事微观社会语言学及其他相关领域研究的学者提供一个学术交流平台,把杂志办成了解国内外语言政策及规划、社会语言生活及其变化的窗口。

我们真诚欢迎这些领域的学者不吝赐稿,为语言政策与规划学科的繁荣发展贡献智慧。

领导和专家寄语

语言是人类重要交际工具，是文化信息载体，是社会资源财富；如果处理不好，也可能变为麻烦和问题。它关系到国家安危、民族兴衰、社会进退、事业成败，乃至个人荣辱，因此，需要制订、实施科学、严谨、实效、可行的语言政策、语言规划和语言战略，以引导、促进语言及语言生活沿着自身演变规律，丰富、规范、健康、和谐地发展，在国家、社会现代化、信息化、国际化中充分发挥积极作用。依据当今中国国情、语情和社会情况，在语言政策、语言规划研究、制订、实施中，必须充分体现“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的国家语言政策基本精神，继续保持主体性与多样性紧密结合，即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主体，各民族语言文字并存分用，各自发挥其作用的国家语言生活主要特色。《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的创办，适逢其时，正合各方面需要，对促进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研究、制定与实施，推动语言规划学术发展与学科建设有重要意义，相信一定会得到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的同仁和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与大力支持，办出特色，显示水平，在实现中国梦当中，发出正能量！恭贺《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创刊！

陈章太

（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原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应用语言学会会长）

2014年5月14日

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是专门从事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将服务于国家、促进外语学科发展视为重要使命。中心近年来将语言政策确立为重要研究方向之一，利用北京外国语大学多语种优势，凝聚了优秀的科研团队，设立了“语言政策与规划学”二级博士点，培养该领域的高级研究人才。多年来，中心承担有关语言政策及规划科研课题10余项，中心专职研究员向教育部等部门提交多项咨询报告和专家建议，为国家政策制定提供参考意见。2014年是我中心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方向值得纪念的一年。在学校及外研社的支持下，中心创办的《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杂志正式出版，为该领域的学者增加了一处发表学术成果的园地。

预祝此刊硕果累累，前途辉煌！

刘润清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首任主任）

2014年6月3日

欣闻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创办《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杂志，特此祝贺！

众所周知，语言文字是人类最为重要的交际工具和信息载体，是文化的基础要素和鲜明标志。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客观环境的变化，语言文字的战略意义日益凸显，与国家安全、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社会进步、文化建设等的关联更加密切，已经成为服务国家发展的重要要素。当前，社会语言生活日益复杂，语言观念日趋多元，语言应用中的价值冲突逐渐增多，妥善开展语言规划，科学制定语言政策更为迫切。作为语言文字事业的基础依托学科，语言政策及规划研究应当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语言政策及规划研究是一门跨领域的新学科，需要不断地自我建构、自我完善。但我相信，面对着当今丰富多彩的语言生活富矿，语言政策及规划研究一定大有可为，一定大有作为。《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的创办，得风气之先，为相关学者搭建了交流平台，无论对于学科的建设还是语言文字事业的发展都将会大有裨益，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好事。

希望《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有灵气、扬锐气、接地气，在传播新知、引领方向、培养队伍、促进创新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祝愿本刊稳健发展，硕果累累。

张洪明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长)

2014年6月3日

以《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命名的正式期刊，终于在北京外国语大学问世了，这在中国可算是第一家吧。谨向该刊创办者表示由衷感谢和崇高敬意！

贵刊的创办是该学科发展及中国语言文字事业中的一件大事，相关教学科研人员及语文工作者无不欢欣鼓舞，从此以后，业内就有了一个展示自己最新研究成果的新园地和新平台了。这必将推动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学科，向着更成熟更繁荣更稳健的方向迈进。

作为语言政策规划园地中的一颗新苗，人们对它的期许，难免会更多更重更大，希望该刊立足中国，放眼全球；关注理论，聚焦实践；有名家大腕引领，又有新人新秀跟进；既有学术影响力，又具学术权威性。我们深知，万事说着容易，做到极难。衷心期望这棵新苗，能在广大业内人士的关注呵护和支持下，茁壮成长，长盛不衰。

周祖谋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副会长)

2014年5月30日

《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

第1卷 第1期 (2014年6月)

目 录

创刊词 戴曼纯

领导和专家寄语 陈章太 刘润清 张浩明 周庆生

特稿

双言双语生活与双言双语政策 李宇明 1

语言政策与规划学科建设

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的学科性质 戴曼纯 5

它山之石，可以为错——语言政策国别研究学习感言 郭龙生 16

关于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学科中四个术语的辨析 张治国 24

语言政策国别研究

法国多语制政策的战略意义与意识形态冲突 李清清 31

民族认同视角下的塔吉克斯坦俄语地位变迁 杨 波 43

全球化背景下俄罗斯语言传播新政策 马继红 51

书刊评介

语言管理：语言规划的新走向——《语言管理》评介 王 辉 60

《少数民族语言与多语教育——连结本土与世界的桥梁》评介 李 丹 65

英文摘要 72

《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稿约 74

格式体例 75

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语言政策沙龙”征稿启事 79

《语料库语言学》稿约 80

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介绍 81

Journal of Language Policy and Language Planning

Volume 1, Number 1 (June 2014)

Table of Contents

Articles

Diglossia, bilingualism and their policies	Li Yuming	1
On the nature of language policy and language planning	Dai Manchun	5
Reflections on studies of language policies abroad	Guo Longsheng	16
Analysis and differentiation of four LPLP terms: Domestic and foreign perspectives	Zhang Zhiguo	24
Strategic significance and ideological paradoxes in multilingual language policy of France	Li Qingqing	31
The change of Russian language's status in Tajikistan: A revie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identification	Yang Bo	43
New policy for Russian language diffusion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Ma Jihong	51

Book Reviews

A review of <i>Language Management</i>	Wang Hui	60
A review of <i>Minority Languages and Multilingual Education: Bridging the Local and the Global</i>	Li Dan	65

双言双语生活与双言双语政策*

北京语言大学 李宇明

语言规划是为语言生活服务的。语言规划该如何制定,语言规划制定得合适与否,要看它是否切合语言生活的实际,是否能够引导语言生活健康发展。因此,要科学制定语言规划,必须了解语言生活,了解语言生活的发展趋势。语言生活既是语言规划学的研究对象,也是社会语言治理的对象和基本依据。

1. 双言双语生活

中国当下的语言生活虽有某些不和谐现象,但总体上还是健康且充满活力的,其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由单言单语生活正快速向双言双语生活发展。

1.1 双言生活

“言”是指一种语言的不同使用变体,普通话、方言、甚至文言都是当今汉语的使用变体。双言生活也包括多言生活,是指在语言生活中使用两种或多种语言变体的情况。双言生活已经成为我国的基本语言生活。

国家层面的语言生活以普通话为主,但是方言也在特定场合、特别领域发挥作用。比如在全国的“两会”上,有用方言讨论国是者;一些高级公务员,有用方言行使理政职责者;国家级的广播电视,也常能听闻方言之音者。省域层面的语言生活,基本上是普通话和方言“双言兼用”;书面语以普通话为主,口语中方言与普通话平分秋色。县域层面的语言生活可能是以方言为主,但普通话使用的场合越来越多,能说能听普通话的人越来越多,普通话的作用越来越大。

从社会领域来看,广播电视领域以普通话为主,但也存在一些方言台、方言频道和方言节目;方言在广播电视中的应用,南方多于北方,地方多于中央,不上星节目多于上星节目。教育领域以普通话作为基本的教学媒介语,但也有教师用方言讲课;方言的使用非师范类学校多于师范类学校,理工科教师多于文科教师,老年教师多于青年教师,高学段多于低学段;此外,方言知识或是方言课,也纳入一些学校的课程。大众服务领域也是双言并用,对大众服务较多使用普通话;企业内部的工作语言,方言占有一定的使用比例。

双言生活古已有之,方言邻接处、移民都市里,古来都是双言兼用。但那时

* 此文是为《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14)》写的序言。文中的一些内容,曾经以《双言双语生活与双言双语人》为题在“2014年中青年语言学沙龙”报告过。该沙龙已经持续多年,这次活动于2014年1月18日举行,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商务印书馆和北京语言大学联合举办,沙龙主题为“双言双语与当下中国”。近闻《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创刊,谨奉此文,以表祝贺!

的双言生活是“自然双言生活”，其特点是双言生活自然形成，双言中共同语的作用不突出，分布范围较小。而今的双言生活是“理性双言生活”，是通过语言统一的社会语言规划形成的，是通过学校教育形成的，普通话在双言中占主导地位，双言生活遍及全国。

1.2 双语生活

“语”指不同的语言。“双语”包括“多语”，双语生活包括民族语和国家通用语、民族语和汉语方言、民族语和民族语、母语和外语等多种类型。我国双语生活也是自古有之，当今的大概情况是：民族地区双语生活逐渐成为主流。当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在双语使用上有些差异，有的地区、有的民族以母语为主，有的可能较多使用国家通用语言。

就全国范围来看，双语生活还只是出现在部分领域和部分场合。在国家重要的政治生活中，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朝鲜族、壮族、彝族等少数民族语言，是会议工作语言。地名标牌、公共指示等城市指示系统，基本采用了双语或多语。政府、企事业单位的网页多数都有双语，起码会有一个英文网页。在国际事务方面，双语居多。在中国召开的国际会议，基本上都采用双语。高等教育领域也有对双语课程的提倡。在通信、交通等公共服务领域，也较多采用双语。甚至在个人生活里也有双语应用，比如名片的正面印中文，背面多数印英文。

总体来说，双语生活在我国还是地区性的和领域性的，没有达到双言生活那样的普及程度，从发展趋势来看也不可能达到普及程度。

2. 多元文化生活

双言双语生活是多元文化生活在语言领域的表现。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我们处在多元文化生活的时代。中华民族是由56个民族构成的大家庭，各民族的文化交融在一起，形成了独特的多元文化。许多民族都有历史文化和方言文化，比如汉文化就有东西南北的差异，有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差异，古今方域的文化交汇在一起，绽开一朵朵文化奇葩。外国文化不断引入中国，比如古代的印度文化，现代的欧美文化、俄罗斯文化、日本文化和韩国文化等，都在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我们的文化生活，中外文化交合在一起，形成文化的百花苑。特别是欧美文化、日韩文化的影响，使中国由传统的多元文化社会发展到现代多元文化社会。

多元文化生活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有大量的双言双语人；是他们把不同的文化汇集在一起，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交融。大量的双言双语人把不同的文化汇集起来，即使是单言单语人，也能够了解和享用多元文化。传统的中国早就是多元文化并存，但是儒家文化占据着统领地位，在文化接触中常常同化其他文化，而且由于社会发展节奏缓慢，文化之间接触的频度、力度相对较小，一般人常常感受不到异文化的影响。而今不然，交通、通信和网络的快速发展，不同文化的

交流速度加快,交流范围加宽。现代通信、传媒和网络,将“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的小夸张说法变成了鲜活的生活现实。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人口大流动。中国的人口流动性前所未有的,流动人口不断从农村到城市,从小城市到大城市,从西部到东部。放眼世界,中国这种人口流动其实只是世界人口流动的一个缩影,全世界人口也在快速流动,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从小国家到大国家,从不发达国家到发达国家。人口流动在世界各地都像是“俄罗斯套娃”,打开一个套娃,里面有一个相似的套娃,再打开一个套娃,里面还有一个相似的套娃。大幅度、高频率的人口流动,带动着文化的流动,给流动者和流动地带来不同文化的体验,多元文化生活逐渐成为生活的常态。

纵向文化传承和横向文化传播是文化发展的两个方向,也是文化扩展的两种方式。过去,文化以纵向传承为主,而今横向传播成为重要甚至是主要方式。横向传播的力度加大,使得文化代沟越来越深,形成代沟的时间急剧缩短,过去几代人才能形成文化代沟,而今一代人、甚至是20年、10年就能形成一条代沟。祖、父、孙三代同堂,60后、70后、80后、90后同戴一片天,但世界观、价值观乃至生活嗜好,却可能大有不同,甚至是大相径庭。与之相关,纵向文化的传承明显受到阻减,故而常常引发社会的文化焦虑。这种文化焦虑,促使社会采取各种“文化保护”措施:第一,努力宣扬、弘扬传统文化,努力防范外来文化的“渗透”,试图让本我文化在后代中顺利传承;第二,利用横向文化传播的机理与机会,让自己的文化“走出去”,更多地对其他民族产生影响。同时也引发人们思考两个问题:第一,如何吸收人类的优秀文化成果来发展自己的文化,使自己的文化更加强盛;第二,让社会能够更好地适应多元文化生活。当然,这种文化焦虑有时也可能助长“民粹主义”、“原教旨主义”等情绪,助长“语言纯洁观”的流行,外来词、外语学习常常成为社会批评和改革的对象。

不管人们怎样思考与行动,多元文化生活是不能回避、不可改变的现实。多元文化生活要求人们具有跨文化生活的能力。跨文化生活能力应主要包括如下方面:第一,应当成为双言人和双语人,具有跨文化的交际能力;第二,建构多元文化的知识框架,了解不同文化的历史与现状;第三,树立正确的文化观,既能了解和守望本我文化,又要学会对异文化的包容与尊重。

3. 双言双语政策

双言双语生活,既是多元文化生活的表现,也是多元文化生活的促进因素。大量研究表明,双言双语对个人的发展具有诸多优越性,比如:可以有更宽阔的文化胸襟,更易客观看待不同文化和亚文化;可以有较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扩大活动半径和生活半径,易于找到较为合适的工作,双语人的就业机会明显多于单语人;有利于开发不同脑区,丰富大脑的智慧等。双言双语人有利于国家进步,能够引进异文化而增加本我文化的发展活力,能够向外传播文化而增加本我文化

的影响力，能够提升国家的语言能力以帮助完成国家使命，能够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乃至与军事、经济等相关的硬实力。

造就双言双语人，营造双言双语生活，需要政策支撑。我国的教育正在批量培养双言双语人：推广普通话造就了大量的双言人；推行国家通用语言、民族之间相互学习语言、外语教育等，造就了大量的双语人或三语人。但是，国家对公民的语种能力还没有出台相应的要求，对双言双语现象还缺少政策视域的研究和政策层面的自觉。在大量的教育实践的基础上，为满足多元文化生活的需要，应制定合适的双言双语政策，并采取相应的有效措施。

合适的双言双语政策，首先能够指导双言双语生活，规范某些层面、某些领域的双言双语生活，减少普通话与汉语方言、国家通用语言与民族语言、中国语言与外语的矛盾冲突，有利于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活。其次，有利于培养优势双言双语人。优势双言人，其掌握的双言中包含国家通用语言；优势双语人，其掌握的双语中，包含地区或世界较为通用的语言。优势双言双语人是国家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内容。第三，能够保证国家特需的双言双语人的培养。国家特需语言，是指国家在外事交往、国家安全、国际维和、文化传承、学术研究、社会服务、经济发展等方面特殊需要的语言或方言。培养国家特需的语言人才，是国家能够拥有处理国内外事务的语言能力的保证。

当前的语言规划表现出较浓的“单言单语”意识。在多元文化和双言双语生活的现实中，应当确立“双言双语意识”，认识到双言双语是先进的语言生活，是未来公民的素质，是强国智民的必由之道。在这种语言意识的基础上，认真研究双言双语生活，研究双言双语人，语言规划及相关政策都能有利于双言双语人的培养和发展，有利于营造双言双语生活，从而使国家和公民都能够适应已经成为常态的多元文化时代。

作者简介：李宇明，北京语言大学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

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的学科性质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 戴曼纯

提 要: 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作为社会大规划的一部分, 具有跨学科性质。由于研究视角众多, 关于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的认识存在较大的差异。本文根据西方学者的最新研究和论述探讨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的界定、学科的形成与发展、成效、理性选择模式及其他主要研究问题, 以期展示学科的基本内涵。以往的研究和实践表明, 语言政策及规划具有区域、时代、政治和社会等方面的局限性, 任何语言政策制定和规划都必须顺应时代的需要。

关键词: 语言政策; 语言规划; 语言多样性

1. 引言

我国近几十年来在语言政策及规划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汉语言文字标准化、推广普通话、少数民族语言建设、语言生活状况调查、外语教育等方面的研究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民族和谐、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做出了巨大贡献。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属于宏观社会语言学范畴, 是关注社会的社会语言学, 不同于微观社会语言学是关注语言的社会语言学 (Nevalainen & Raumolin-Brunberg 2012)。作为当代社会语言学分支学科的语言规划具有跨学科性质, 迄今已有 50 多年历史 (Jernudd & Nekvapil 2012)。语言政策及规划作为一个学科源于西方学界, 其主要思想和理论视角值得我们借鉴。本文主要讨论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的界定、学科的形成与发展、成效、理性选择模式及主要研究问题, 以期展示学科的基本内涵。

2. 语言政策及规划的界定和本质

语言政策及规划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 小到词语发音和使用, 大到语言选择和学习, 都属语言政策及规划范畴。语言是构建群体的关键要素之一, 所有儿童都被各自的语言群体社会化, 成人则努力保持自己在群体中的交际能力, 教会儿童掌握群体使用的词汇和语言结构, 并适时纠正。因此, 所有人都在某种程度上管理、保护、推广语言, 各种形式的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在不同社会应运而生 (Wright 2007: 164), 个人、家庭、公司、组织和政府都可能是语言政策和规划的主体。

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犹如一对连体孪生兄弟,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却又各自不同。学者们在各自的论述中对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做出了不同界定, 背景有异, 用意不同。美国学者 Einar Haugen 于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提出的语言规划概念, 指的是一切旨在改变言语社团语言行为的所作所为。语言政策有时被用作语

言规划的同义词,但准确地讲,语言政策是具体语言规划过程背后更宽泛的语言目标、政治目标和社会目标(Deumert 2009: 371)。也有学者(Skutnabb-Kangas & McCarty 2008)认为,语言政策是一种社会文化过程,包含官方颁布的法案和文件,以及关于语言形式和运用是否合法的日常语言规范;语言政策影响某一政体内语言或其变体的地位、权利、作用、功能和使用,以及社会组织和制度。语言规划也是社会文化过程,往往通过地位规划、本体规划、习得规划促使人们改变语言的使用。语言规划可能受以下一种或数种导向的影响,(1)语言被视作问题(因而必须消除语言多样性),(2)语言作为权利(在语言竞争环境中解决语言权问题),(3)语言是资源(促进语言民主和多元化)。总之,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均具有社会、政治和文化属性。正是这些属性使二者密不可分。

我们再看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的另一种界定。Fishman(1974)把语言规划界定为刻意改变语言地位、结构和习得所做的努力。语言规划是社会规划大范畴(包括住房、就业、迁徙、税收政策在内的广大公共政策领域)的组成部分,有明确的目标和实施方案。语言政策指官方机构和部门(如教育部、校方、单位领导层)实施的隐性或显性语言规划。语言政策可以是国家或机构针对语言结构、使用和习得制定实施的指导方针和规定,既可能是明文规定(如语言政策入宪)也可能隐而不言。虽然语言政策由政府机构制定和推行有其优势,但是大多数学者认为语言政策既可由公共机构(如政府机关、学校、法院)负责,也可由私人机构(如公司、企业、非政府组织)自行制定(Tollefson 2011: 357)。上至政府机构下至黎民百姓制定的语言政策及规划均会对社会结构和发展、人们的生活等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

语言政策及规划的实施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语言教育。仅有地位规划和本体规划而无习得规划便无法达到目标。习得规划负责地位规划和本体规划的实施。一旦政策制定者确定某一语言在公共生活领域的作用及具体语言形式,语言习得就由教育工作者负责组织实施(Cooper 1989: 1),即习得规划通过语言教育和规划来完成。而语言教育政策指正规教育中和语言习得有关的政策,一般包括各级政府的法规和文件,下属机构的常规工作等(De Korne 2010)。

早期的语言教育政策及规划与现代化和发展理论相关且有三个关键的共同点:(1)乐观地认为语言教育政策及规划使少数民族语言群体受益;(2)政策及规划专家应当在制定、实施高效合理的计划和政策方面扮演重要角色;(3)学术研究及实践应当聚焦于民族国家。一般认为政府的教育机构在语言政策及规划活动中起主要作用,这一认识使早期研究采取自上而下的视角。但是,早期的做法有几个不足:(1)忽视了社会政治体系的复杂性,政策与实施成效之间的因果关系极为复杂,社会群体往往有不明言的不同目标;(2)关注国家政策和规划,忽略语言教育对象的态度和语言习惯;(3)过于相信语言教育政策及规划整合小族语言群体的价值(Tollefson 2008: 4-5)。之所以出现以上问题,是因为语言政策及规划

具有区域、时代、政治和社会等方面的局限性。政策及规划的指导思想在变化，彼时彼地可行有效的做法在此时此地已失去价值。

3. 学科发展脉络

一般认为，现代语言政策及规划研究进入社会语言学领域始于20世纪60年代，兴起于70年代，学科发展与当时许多亚洲和非洲新独立国家面临国语选择和推广问题有关。语言选择、标准化及推广，国家团结与发展等问题吸引了大量学者对其进行研究探讨，使学科朝着问题驱动型方向发展。但是，语言是否能人为规划在学科发展初期备受质疑。当今学界认为语言可以被规划，但并不意味语言应当被规划（Deumert 2009: 371）。现代语言学作为一门科学早已摒弃规定语言学，语言学界执牛耳者为结构主义语言学。结构主义对语言规划持反对态度不仅因为结构主义的理论基础与规定主义截然不同，而且还因为语言规划超出了语言学范畴，是一门关注政策制定和实施、带有明显的社会政治色彩的跨学科（Jernudd & Nekvapil 2012: 17）。来自非语言学领域的理论中（尤其是社会文化理论），有的带有整合社会的倾向，有的则推崇语言文化多样性。关于语言的不同认识论在语言政策及规划研究界表现出不同倾向：语言纯洁主义、描写主义、自由主义等。正因如此，语言政策及规划领域迄今为止尚未出现主流理论。

为了了解语言政策及规划学科的本质内涵及发展脉络，我们可以参考新近出版的《剑桥社会语言学手册》（2011）和《剑桥语言政策手册》（2012）。前者的作者之一Tollefson（2011: 357-376）对语言政策及规划的发展做了一个简要的归纳整理，将学科的现代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经典及新经典时期、批判与幻灭阶段、学科复兴阶段。后者专辟一章（参见Jernudd & Nekvapil 2012: 16-36）简介语言政策历史，分为四个阶段：前现代、近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前现代阶段的典型代表是1635年成立的法兰西学院及其推行的语言政策及规划，法兰西学院被视为欧洲许多类似机构的典范。19世纪欧洲兴起的民族运动以语言规划为手段，以满足语言和文化需求为由，将社会目标 and 政治目标合法化，并试图完成这些目标。前苏联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语言政策及规划属于近现代类型，但是兼具前现代和现代阶段的部分特征。而捷克斯洛伐克同期由布拉格语言学派推行的语言规划带有明显的现代阶段特征，即重点关注微观层面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忽略社会问题，注重细节，不求大变。1918年从哈普斯堡帝国废墟中建立起来的捷克斯洛伐克族群较多，族际交流问题严重。布拉格学派致力于完善多数人使用的标准捷克语，其语言完善理论享誉世界，被后来的“经典语言规划”认可接纳。作为布拉格学派语言规划标志的基本概念（如语言规范、语言功能、语言雅化、语言培育等）对后来的语言政策及规划产生了重要影响。

下面我们主要根据Tollefson（2008, 2011）及Jernudd & Nekvapil（2012）的阐述，结合其他学者的观点，简要介绍现代语言政策及规划学科的发展阶段。

3.1 (新) 经典阶段

近现代语言政策及规划的大部分研究聚焦于设计语言政策及规划的理论框架,研究有限的实际问题,例如新兴民族国家的本体规划。早期研究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和国家发展密切相关,受现代化理论影响严重(Tollefson 2008: 3-4)。学科发展初期一方面缺少理论,另一方面关注的问题不够全面。因此,不少学者借鉴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指导语言政策及规划研究,关注的问题由此拓宽,涵盖语言本体和语言相关问题。

根据Tollefson(2011)的观点,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为学科发展经典时期(包括后期的新经典阶段),为语言政策及规划奠定了基础。这一阶段的学者主要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在大量案例研究和理论探讨的基础上提出这样的观点:语言是南亚、东南亚和非洲初建国家面临的社会、政治及经济挑战中最核心的问题。例如,后殖民国家的教学语言是否应当继续使用殖民者的语言?地方及本土语言是否应当通过标准化最终在公共领域代替殖民语言?多语国家应当如何选择自己的通用语?各不同教育层次应当实施什么样的语言教学方案?没有文字的语言或一语多文的语言是否应当设计新的书写系统?此类问题,不一而足。许多情况下,这些问题成为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现代化和国家发展的核心问题。语言政策及规划在发展初期被认为对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语言问题具有重大的实用价值,而实际上其价值远不止此,语言政策及规划还可以用于解决和语言相关的问题(如多民族国家的民族融合、政治架构)。初期的语言政策及规划仅区分地位规划(确立语言变体的社会地位,如教学语言、行政管理语言、司法语言)和本体规划(针对语言结构方面实施的规划,包括标准化、词库建设、创制文字、纯洁化、国际化等),后来才加上习得规划(通过语言学习推广语言,促进语言传播)。实际上,地位规划和本体规划并非泾渭分明、非此即彼,本体规划往往是地位规划的手段或延伸。虽然语言政策及规划发展初期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或操作模式,但是对学科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大量案例研究得出一条关于多语社会语言问题的重要结论:多语社会最好是稳定的双言社会,即两种相近的语言变体明确用于不同领域。双言概念的含义在语言政策及规划学科发展过程中也发生了变化,涵盖范围更广,即不同语言使用范围采用了两种(甚至两种以上)语言变体(包括同属一门语言的方言、社会方言,乃至不相关的语言)。双言的稳定性主要在于语言变体不是竞争关系,而是各司其职的互补关系;双言的功能划分是社会的自然选择。如果双言的使用范围出现交叉,则可能导致不稳定的双言关系。对此,语言政策及规划制定者必须充分考虑多语社团的利益,清晰划分不同语体的用途。(新)经典时期的理论与实践依然在影响当今的语言政策及规划研究,没有地位规划、本体规划和习得规划,语言政策及规划就无从谈起。